

历史罪恶,铁案难翻

——评日本出版的《满洲国史·总论》

王元年

1932年,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的傀儡政权——满洲国,早已随着日本法西斯的败降而覆灭。关于伪满洲国这段历史,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曾对日本在伪满14年的殖民统治做了结论,铁案已由历史铸成。

然而事隔数十年,日本国内某些仍然具有军国主义思想的人,竟出版了一部充满帝国主义论调的《满洲国史·总论》(下简称《满史》)^①,企图为历史翻案。这仅是日本“满洲国史编纂刊行会”一整套出版物中的头一卷。该书1971年由日本第一法规出版社出版发行,前伪满协和会中央本部部长平岛敏夫写了发刊词,甲级战犯、曾任首相的岸信介等11人分别写了“推荐辞”。文中肯定赞颂《满史》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壮举”,“是一部世界史罕见的具有特色的文献”,并希望每个日本人都能读一下这本书(第12页),等等。笔者阅过此书,深感它并非一般史学专著。书中全然不顾历史真相,肆意颠倒黑白,竭力为日本法西斯罪行翻案。通过对此书简要剖析,相信读者会得出这一结论。

一 鼓吹“特殊权益”,否认战争侵略

东北,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遗憾的是《满

^① 《满洲国史·总论》,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1991年翻译出版(内部发行)。以下未标明出处者,均引自此书。

史》竟置中国主权于不顾，一再声称日本在东北的“特殊地位”或“特殊权益”。这种“特殊地位”或“特殊权益”的根据何在？《满史》做了进一步的解释，说“日本在满蒙获得特殊地位或特殊权益的主要原因，乃是根据1905年日俄讲和后的日清条约，以及1915年的对华二十一条要求……”（第58页），于是便产生了日本在满蒙的特殊权益问题。这里帝国主义侵略嘴脸已暴露无遗了。凡有一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日清条约”和“对华二十一条要求”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强加于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按照这种不平等条约来论证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地位”岂不仍是迷恋昔日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立场？《满史》在解释“特殊权益”时另一个论据是所谓“毗邻”地理位置与历史“交涉”形成的结果，这又是指什么呢？《满史》几乎是直言不讳地说：“无论如何，做为日本在满蒙持有的特殊权益，其特征主要还限于依据条约的规定，满蒙同日本原来就有地理和历史上的密切关系，而政治的和经济的关系又与之相纠缠在一起，以至不久便产生了‘满洲是日本生命线’的说法。”（第58页）真是奇谈怪论！有什么地理和历史的“密切关系”呢？挑明了说，就是不平等条约没有规定的，条约以外的也是日本的特殊权益。因为满洲离日本近，便于扩张侵略，加上历史上交涉侵占的既得利益，统统都成了日本的特殊权益。于是满洲就成了“日本的生命线”了。这是什么逻辑！

这种用任何以不平等条约为依据，外加所谓“毗邻”关系、“历史交涉”等原由而炮制的“特殊权益”论，实质是“侵略合理”论。不错，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用这种强盗逻辑侵华的现象。那么到了20世纪后半叶，人类已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满史》编纂者们仍然顽固坚持帝国主义立场，对所谓“特殊权益”大加肯定推崇，其目的就在于否认日本对东北的侵略性质，向日本国民宣扬军国主义思想。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关注和警惕。

二 制造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欲盖弥彰

世人皆知，伪满洲国是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傀儡政权，而《满史》却否认这一点。书中以当时日本政府和伪满政权的腔调写道：“满洲在地理上、历史上均与中国本土不同，处于特殊地位，而当地居民憎恨张氏（指张学良）暴政，为保境安民而自发地创建满洲国”，“满洲国并非靠日本军部或官方操纵而建国，乃是根据满洲当地居民一致之愿望而产生。”（第249页）究竟是“自发”、“民意”还是日本殖民者操纵？然而，真是欲盖弥彰。由于《满史》要歌颂日本帝国主义的“丰功伟业”，给那些军国主义分子树碑立传，作者详细记述他们的行径，从而披露了日本政府和军部策划拼凑伪满傀儡政权的阴谋活动。《满史》在记述日本以什么形式统治东北的问题时，写道：九一八事变后，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在沈阳旅馆的参谋长房间，三宅参谋长、土肥原、石原中佐、片仓大尉等人聚集在一起商议对策。在会上板垣大佐提出占领方案；土肥原大佐提出建立以日本人为盟主、五族共和的方案；建川少将则主张建立以旧清朝宣统皇帝为首脑的亲日政权方案”。（第115页）经讨论同意建川主张，建立一个以清朝末代皇帝溥仪为“元首”的伪政权。这是日本拼凑伪满傀儡政权最早的具体方案。接着，书中写道：23日，关东军向日本驻天津司令官发出电报，请求派兵保护清废帝溥仪以及汉奸大臣罗振玉等人，并同大汉奸张景惠、熙洽、张海鹏、于芷山等人取得联系。关东军参谋部综合研讨各方方案后，完成了《解决满蒙问题根本方案》，于10月25日呈报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方案规定：“方针，同中国本土割离，表面上由中国人统一，实权掌握我手中，以东北四省及内蒙地域为版图，建设独立之新满洲国。”（第119页）1932年1月6日，日本政府终于制定了一个所谓《满蒙问题处理方针要纲》，确定第一步为拼凑一个脱离中国的伪政权，然后再把它装扮成一个“独立国家”。

《满史》为了更具体的歌颂一些军国主义者的“功绩”，不厌其烦地罗列了东北各地的“自治”、“独立”过程，但这又恰恰暴露了所

谓“自治”、“独立”运动，完全是日本侵略者一手策划的。如1931年9月26日，吉林在“关东军派今田大尉协助下，改组吉林省政府”。（第127页）28日，熙洽宣布“独立”。10月1日，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在关东军策划下，在洮南宣布“独立”。同月，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在关东军利诱胁迫下宣布“独立”，管辖辽宁东部23个县。11月7日，于冲汉根据日本“金井顾问关于今后政治之根本在于实行‘王道政治’的意见”（第126页），宣布辽宁“独立”，不久改名为奉天省。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大佐的策动下，在哈尔滨宣布“独立”，成立东省特别区。

在拼凑省政权的同时，县一级政权也开始筹划。以汉奸于冲汉为部长的所谓“自治指导部”的顾问和各地工作部的部长、委员都是日本人。在“自治指导部”的指导下，向各县派遣以日本人为主的“指导员”，操纵建立县级政权。先从辽宁开始，然后逐步展开。

1932年2月17日，在关东军指使下，张景惠、臧式毅、熙洽等几个大汉奸纠集在一起，在沈阳成立“东北行政委员会”。翌日，发表所谓“独立宣言”，宣布建立新国家，同中国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第217页）

同年3月1日，“东北行政委员会”正式发表了“满洲国”政府宣言。同时经过多方策划，将清朝废帝溥仪挟持到伪满洲国首都新京（今长春），由他担任伪政权执政。

在傀儡政权实行什么样的国体、政体问题上曾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溥仪、清室的遗老遗少、蒙古诸王和张海鹏等都热衷于复辟帝制。所谓“文治派”的臧式毅、张景惠等，则主张总统制。两种意见互不相让。最后由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裁决：“遵循民本主义，政体为执政政治，执政施行善政数年后，如人民赞许并拥戴执政之德政时，即可即皇帝位。”（第182页）于是溥仪就位执政两年后（1934年），日本为了把这个“满洲国”打扮成“王道国家”，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年号由“大同”改为“康德”。

我们从“满洲国”这个傀儡政权的酝酿，建国方案的制定，直到溥仪的出台过程，不难得出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中相同的结论：满洲国“不能认为由真正及自然之独立运动所产生”。^① 伪满傀儡政权完全是由日本侵略者一手制造的。

三 标榜“平等”、“尊重”，掩盖日满主仆关系

日本帝国主义既然制造了伪满这个傀儡政权，当然要把它作为工具来使用，事实也正是这样。《满史》却采取自欺欺人的手法，引证《日满议定书》中一些美丽动听的词句，如“善邻关系”，“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用以证明日满关系是“平等”的，“互相尊重”的。不错，漂亮词藻是有的，但实际情况如何要看事实，而且即使从文件规定中亦可看出“满洲国”是仰赖日本而生存的。比如议定书中的具体条款明确规定，伪满要承认和尊重日本在满的一切“权益”，为“共同防御”，“需要日本军驻扎于满洲国”等。此外，日“满”还有密约，其要旨是：（一）伪满“国防”和“治安”由日本管，所需经费由伪满承担；（二）铁路、港湾、水路、航空交日本或日本“指定的机关”；（三）日本人担任伪满各级官吏，人选由日本定。（第344页）

1934年3月1日伪满实行帝制时所颁布的《组织法》中虽然规定：满洲帝国由皇帝统治，即皇帝统揽立法、司法、行政大权，并统帅陆、海、空军。（第430页）但是，实际掌握大权的不是“皇帝”溥仪，而是“皇帝”之上的“太上皇”关东军司令官。1936年9月18日，关东军司令部在《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之本质》一文中，对天皇、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说得明白而露骨：“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心而即位，以天皇之心为己心，作为在位之条件，永远于天皇之下，成为满洲国民之中心……因此，万一皇帝违反建国理想，不以天皇之心为己心，则应根据天意，禅让放

^① 罗家伦主编：《革命文献》第40辑，第9351页。

伐。”(第 605 页)尽管他们口口声声说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又一再强调：“满洲国之宗主权，实掌握于皇道联邦之中心日本天皇手中，皇帝为皇道联邦里之独立国家之主权者，关东军司令官乃是天皇之代理人，为皇帝之师傅、监护人。”(第 605 页)这样，皇帝溥仪还有什么“统揽大权”可言呢？

按照《日满议定书》和密约的规定，伪满各官署官吏需任用日本人。伪满的最高行政机关国务院，实行所谓“总务厅中心主义”。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国务院内设总务厅，总务长官由日本人担任。总务厅高于各部，国务总理听命于总务厅长官。如果说关东军是伪满的“太上皇”的话，总务厅长官则是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国务院各部都设日本人为次长，事无巨细，权操于日本次长手中。

省一级的伪政权也推行“次长制”，各省副省长概由日本人担任。他的地位与作用如同伪国务院的总务厅长官和各部次长，都是该省把持一切的实权者。县(旗)都设日本人为副职掌握实权。

我们通过日伪之间签订奴役性的条约和伪满各级政权机关人员的配备，不难看出日本和伪满之间的关系根本谈不到平等的国与国的关系，而完全是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主仆之间的关系。不管日本帝国主义搞什么承认“新国家”的外交把戏，或者把伪满打扮成“大满洲帝国”、“独立国家”的模样，都改变不了伪满作为附属国傀儡的性质。

四 歌颂“王道乐土”，颠倒殖民统治的罪恶历史

《满史》编纂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否认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残酷压迫和掠夺，否认其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宣扬日本对东北的“开发”和“高速度发展”；夸耀其所创造的世界史“奇迹”；说东北是一片“王道乐土”，是建立近代国家的“楷模”等等。(第 6 页)事实真是这样吗？让历史来作证吧！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维持其殖民统治，始终采取武力镇压政策。

“1936年6月8日，关东军发布满洲国内以治安为第一主义的声明”(第331页)，以“治安肃正”为名，对东北人民的反抗进行残酷的军事扫荡，对无辜的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对此，《满史》不打自招地说：“治安肃正大见成功。在日满议定书签字当时，在全国号称36万的匪贼到33年8月末骤减到6万5千人。”(第331页)震惊世界的“平顶山惨案”是一次惨绝人寰的大屠杀。1932年9月15日，日本侵略军为报复抗日武装的袭击，将辽宁省抚顺的平顶山村3000多居民集体屠杀，烧毁房屋7000多间，使平顶山村变成一片焦土。1936年，关东军和伪军警对通化一带山区的一次扫荡，出动了5万多人，烧毁了2700多户，屠杀5000余人。伪满统治的14年，类似这样的大屠杀有案可查的就有近百起。尤其惨无人道的暴行是，关东军七三一部队用中国人做细菌武器试验，死于该部队的中国军民达3000多人。

日本在军事扫荡的同时，又实行“归屯并户”政策，大搞所谓“集团部落”，大搞“无人区”。对“集团部落”和“无人区”这一事实，《满史》也不得不承认，说为了“治安肃正”，在东北“实行保甲制度，建设集团村屯，设立无人居住区。”(第507页)“制定保甲规约，牌内出现扰乱治安的犯罪人时，各家长连带责任，课以连坐法”(第341页)，并规定：“县城附近3里之内，指定小镇的2里之内，铁路两侧各500米，以及国道左右1里地区内，禁止种植高粱、玉米等高棵植物”。(第338页)而日本竟把这种“集团部落”说成是“王道小社会”。“满洲国”就是由这样的“王道小社会”构成的大社会。如果说“集团部落”是个小监狱的话，那么“满洲国”就是一个大监狱。

《满史》编纂者们最得意的是用大量的篇幅来描绘日本对东北的产业“开发”和各方面建设的“贡献”。从工农经济、交通运输、邮电通讯，以及文教卫生等各方面，夸耀其“高速度发展”和“奇迹”般的“功绩”。我们并不否认当时的东北地区在经济发展的某些方面，如重工业、铁路运输业等，较我国关内一些地区发展速度快。但这是什么原因呢？东北煤铁资源丰富，原来已有初步工业基础。而关

内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时期,沿海沿江和交通干线附近,战火弥漫,日军铁蹄肆意践踏蹂躏,经济怎能发展呢?而且我们还要分析日本帝国主义对东北的“开发”其目的是什么。1935年9月15日,关东军小矶特务部长对满洲经济统制的根本方针作了如下规定:“满洲资源的开发,得以形成为东亚的重要兵站基地。满洲对日本的贡献在于对投资提供利润,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提供资源及移民地区,以及解决日本的人口、粮食问题。此外满洲在地理上处于日苏势力的缓冲地带,可谓是日本的生命线,属于国防的重要地区。”(第398页)在这里,所谓“开发”、“贡献”、“奇迹”、“楷模”等所有谜底统统被揭开了。其实质不外以下两点:第一,日本对东北的开发是服务于日本国内,特别是服务于日本帝国主义对外军事扩张的需要。第二,日本对东北的开发,是为了掠夺资源和原料,扩大投资场所。第三,伪满的经济大权完全为“满铁”、“满业”两大机构操纵,从总裁到下属所有人员都是日本人。1935年成立的“日满经济共同委员会”实际上也由日本一家操纵。

从上述伪满经济的性质、特点、作用及权利所属来看,伪满经济是典型的畸型发展的殖民地经济。对于这样一种经济形态,《满史》所列举的产业开发、经济发展、贸易增长等数字,只能说明一个问题:即开发越多,“贡献越大”,则掠夺越凶,搜刮越重;它非但没推动东北社会的进步,给东北人民带来幸福,而是使东北在日本殖民统治下越陷越深,广大人民遭受的苦难愈加严重。

日本为了掠夺东北的煤矿资源,实行了一种“要煤不要人、用人换煤”的“人肉”开采政策。在矿山开采上,采取“杀鸡取卵”的办法,滥采乱挖,瓦斯爆炸事件不断发生,造成千万矿工丧失生命。仅1939年,抚顺煤矿死亡人数就达10190人,平均每7名工人中就有1人丧生。从抚顺每运走800吨煤,就留下中国工人一具尸体。日本掠夺的煤是由中国矿工的尸体换取的。日本挖走的是我国东北的无数宝藏,留下的是“万人坑”和累累白骨。仅鸡西煤矿较大的“万人坑”就有七处,坑内尸骨达10万余具。

《满史》十分赞赏日本向东北移民这项基本“国策”，公然写道：“如何解决日本的人口问题，乃是日本当政者伤脑筋的重要政治课题之一。满洲国的建立，成为移民对象，犹如久旱之喜逢甘雨。”（第435页）日本制定的移民计划是“宁速勿迟，宁多勿少”的原则。（第436页）计划“20年内移民100万户”，“50年后在满蒙居住之日本人最少限度达到500万人为目标”。（第436页）伪满14年间日本共移民10万户，20几万人。为了移民，日本还以各种手段霸占东北耕地。如“在中东路和牡丹江、松花江、乌苏里江划定三角地带，移入屯田兵，以每垧1元的单价，收买未开垦的荒地”。（第440页）对这种实际是强夺的“收买”，《满史》也不得不承认：“说是未垦地，实际是将熟地（耕地）和荒地平均后定价格为1元，实属过低”。（第440页）同时日本还大量没收土地实行霸占。

日本为了扩大战争，保证军需和国内的粮食供应，在东北实行所谓“粮谷出荷”^①强制征购粮食。《满史》赞颂日本征购的“苦心和努力”，说：“为落实基层和街村的征购任务，在各县（旗）长副县长（旗参事官）的临阵指挥下，官民全力以赴，将农产品的征搜工作，做为战时下地方行政工作的最大重点来进行。”（第761页）仅1942—1945年，在“出荷”的名义下，日本从中国农民手中夺走了1400万吨粮食。（第761页）与此同时，对中国城市居民实行粮食“配给”。沈阳1943年成人每月只“配给”粮食7公斤，人们只好用豆饼、秕糠、橡子面充饥。如果从哪里多弄了点粮食就会大祸临头，若吃了一口大米饭被发现就要被定为“经济犯”，或“罚款”或坐牢。1943年抓拿群众，扣以“经济犯”罪名罚款坐牢，共达132264起。^②

① “出荷”，本意是“商品上市”，但伪满时是以此名强征以粮食为主的农产品。有时给很少一点钱或少量的布为代价，经常是白白拿走。

② 关东军调查室，《关于黑市对策的研究》（1944年1月），转引自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382页。

“勤劳奉仕”^①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普遍实行的一种奴役性的劳动政策。凡是当“国兵”不合格者，都编入“勤劳奉仕队”。这样，每年有200多万人被抓到工矿或军事工程地强制劳动。

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与疯狂掠夺、野蛮屠杀相辅而行的是大搞思想专制和奴化教育。“特高课”专门抓捕反满抗日的“思想犯”。所谓“矫正院”就是以“思想不良”为名迫害有进步思想，有民族意识的知识分子和工农群众。

《满史》胡说“满洲国是语言、风俗历史不相同的多民族国家，又是没有国家传统的国家”（第612页），鼓吹“振兴统一之大同协和之民族精神”，实行奴化教育摧毁民族意识的“功绩”。伪满时期把“天照大神”、“天皇陛下”以及溥仪“诏书”等充塞到学校教材中，把国文改成“满语”，把日语改成“国语”，使学生只知有日本、“满洲国”，不知有中国。凡是不合于“建国精神”的思想意识，文化作品全部禁绝，严厉压制一切进步的民族文化，大肆鼓吹关东军、“大东亚共荣圈”、“八 一”等军国主义侵略思想的“美”。

五 名为写史，实是为军国主义招魂

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殖民侵略，以及制造傀儡政权，是世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但是战后多年来，以至今日，仍有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宣扬日本在我国东北的殖民统治，怀恋“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并利用“怀旧”、“乡愁”等抚今追昔、感慨万千的情调，在日本人民中间进行蛊惑和煽动，掀起一阵又一阵的民族复仇主义浪潮，最集中突出的是歪曲侵略我国东北的历史，宣扬日本殖民主义的“功绩”，美化伪满政权的14年统治。

由甲级战犯岸信介主编的《啊！满洲》一书，纠集了一批日本战

① “勤劳奉仕”：“勤劳”意为为职事劳动，狭义指体力劳动。“奉仕”，指不计酬的服务。伪满时，如将“国兵”强征去修建公路等苦力劳动就是“勤劳奉仕”的典型形式。

犯,以《回忆录》的形式,歌颂日本关东军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个“光荣”,由它创造了“满洲国”,歌颂“满铁”给东北这个落后地区带来了“现代文明”等等。

战后,日本出版了数以百计的有关伪满洲国的著述。其中,当然不乏有尊重历史、正视现实的有识之作,如著名学者井上清先生等,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都作过公正的论述和科学的分析。但由平岛敏夫写《发刊词》,岸信介领衔写《推荐辞》的《满洲国史》在这股复仇主义逆流中起了恶劣的作用,参与该书编写的几乎全部都是伪满经济、政治、司法、军警宪特、厂矿企业和文教等部门担任要职的日方人员。他们以写史的面貌编写了一部多达170万字的“史书”。这些人本应“在冷静、严肃、谦虚的反省基础上,进行如实的整理和叙述”,写出一部有郑重反省态度,深刻批判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统治东北的罪恶史。遗憾的是,他们没有这样做,而是抱着否定“战胜国一方的观点和资料”和批判“把创建满洲国同西方的殖民地混质相谈”(第6—12页)的立场,反其道而行之。全书为一种恶劣的“怀旧”气氛和露骨的“复仇”情绪所笼罩。该书甚至在《发刊词》和《推荐辞》中写道:“不幸的是,满洲国只生存了短短的十三年便消亡了”,“但是在这十几年当中,我们学到了许多东西……并对将来也会发生作用。”(第28页)“将来会发生作用”,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还要用统治我国东北的经验,来实现“大东亚共荣圈”的美梦?我们把他们“满史”的这种怀念昔日殖民主义的情绪同80年代以来的修改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为旧法西斯军人授勋、修墓等一系列事件联系起来,不能不对战后日本社会至今尚存的军国主义逆流深感不安和忧虑。当然,今天时代毕竟和二次大战时不同了,已不是少数战争狂人就能把战火挑起来的。不过我们还是要时刻警惕和揭露日本右翼集团怀念军国主义和殖民统治的活动,以利中日两国真正友好和亚洲及世界和平。

(作者单位:北方工业大学社科部)